本书既有科普性质，旨在以简明的概念向一般的读者讲述道理，又有学术研究的价值，因为本书是作者陆铭平日里研究思考的沉淀，本书也有向政策制定者劝诫的意思在里面。

本书分为两个部分，上篇“大国难题”是从国家层面展开。作者先从欧盟说起，货币一体化的欧盟国家，却由于内部缺乏完全的人口自由流动，不同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，致使在经济危机中在希腊等国爆发了欧洲危机，影响了整个欧元区的市场稳定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实际上中国内部的各省份间，也有“欧元区化”的趋势或情况存在。在“大国”部分，作者主要想向读者介绍的的观念，为区域间的自由流动。作者认为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，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碍之一，就是国内不同区域的流动存在限制。作者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自由移民给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好处，以及不这样做（即当下的情况）的恶劣后果。对于后者，作者着重描述了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机制的“扭曲之手”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、土地和户籍制度约束了人口的流动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。作者批评了“西部大开发”这样的“动钱”政策，提倡“动人”。

下篇为“大城之解”，作者将视角从国家转向城市，先是辩驳了关于大城市的几个常见的误解，如认为中国城市化过快、应该限制大城市的人口增长、大城市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等等。接着作者对几个城市病做了剖析，指出中国大城市的问题不在于人口太多，而是基础设施不足。对于大城市本身，政策上应该做的不是限制城市人口、阻止人口流入，而是应该在开放人口流动的情况下，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，营造更包容的生活环境，加速城市化。经济的集聚带来的是优势而非劣势。

前面提到本书有“劝诫”的意味，指的即是作者对放开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，改革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呼吁。仅就本书中所写，作者意识到了改革的阻碍为 全局的和长期的利益与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的矛盾，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。如果我们结合《转型中的地方政府》中提到的所谓“集权-分权”悖论，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。“集权-分权”悖论指的是，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最集权的，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权力又好像是最大的，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本书所说的地方主义问题，地方政府只愿意管好自己的事，而不愿意站在全国的大局着想。笔者认为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“地方主义”或国家政策的问题，而是这样一套中央-地方的政府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矛盾。中央政府要求在某些特定的方面集中最大的权力，势必要将另外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。这一集权的特征，即全国的官员系统在本质上是同一的、可对照的，这要求官员的升迁具有相近乃至相同的量化指标。于是集权的政府只能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，却不能分散力量因地制宜，在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、考核标准。就比如，一律以GDP的高下来衡量，就使得某些本就地理上没有优势的政府饮鸩止渴，吸引一些污染企业入驻，或是限制人口的外流，或是浪费资金在收益率低的地方大搞投资、建设，违背市场规律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中国官员体系的一体化管理、党对所有的领域的全面管理，都是放开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、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阻碍。

中国发展最深层次的问题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，但触及到深处，则关乎“党国体制”的“根本性”问题，户籍制度的另一面，还有特权与权力的纠葛存在。作者可能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也可能对问题的牵涉之深还没有完全的认知。执政者未必不知道改革带来的好处，但这是对全局的，而不是对其个人的，或许就像有学者说的，这是“摸石头上瘾”了。